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共产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历程中的思想成果

刘希刚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视阈下考量,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形成了“利用改造自然思想”、“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系列一脉相承、创新发展的思想成果。中国共产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程中的系列思想成果,呈现出结合不同时期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历史逻辑,体现着我们党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理解把握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整体的历史性跃升,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历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看作同一过程,强调“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正是自然历史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制约及其内蕴的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在人类文明史上经历着不同时代和状态的更替,并体现出每个国家或民族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人与自然和谐追求之路,伴随着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在70年间走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经历了“自然要素服务农林水各业并举”、“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国家战略与民族复兴大计”的不同时代主题。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历史逻辑表现为结合不同时期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渐进性历史进程,表明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矛盾不断升级、内容不断分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根本上更表现为一个社会发展问题,尤其表现为一个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密切相关的发展战略选

刘希刚,法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京 10009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创新研究”(19BKS078)、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研究”(18MLB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择问题。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认识与追求体现出由点到面、由偏到全、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发展特点,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了从依附于经济建设,到社会主义事业,再到转型发展基础,最后到国家重大战略的地位跃升,形成了一系列前后继承、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思想成果,依次是“利用改造自然思想”、“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历程,总结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时代主题及其思想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扎实推进与科学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的“利用改造自然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国情背景下恢复发展经济,巩固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这一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家底子薄弱、经济水平亟待恢复、国民经济体系有待健全、人民生活渴望基本满足,而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千疮百孔的自然界为社会生产提供的资源能源不足。经济作为国运之基,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在面临急迫发展经济的压力、国际安全挑战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关心生态环境恢复,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历史阶段的生态建设实践,形成了围绕“自然要素服务农林水各业并举”时代主题的“利用改造自然思想”成果。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党的生态建设实践

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绿化祖国、兴修水利、加强环保等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等建设行动,体现出党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不懈努力。一是保持水土,绿化祖国。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始终受到毛泽东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初,水土流失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近六分之一,毛泽东将水土保持看作是垦荒工作的遵循原则,要求尽最大努力防止水土流失。1956年国务院设立水土保持委员会,“大跃进”期间共有60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治理。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水土治理先进典型,如山西的大泉山、贾家垣、羊井底,甘肃的邓家堡、张家岔、杨家沟,陕西的吴家畔、杜家石沟等,以其先进经验发挥了带动示范作用。与重视水土保持同步的是全国性植树造林运动。1955年12月毛泽东批示要求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种树,提出12年内全国基本消灭荒山荒地的目标。毛泽东一直号召群众植树运动,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关注加强山林管护、制止山林破坏,全国出现了河北塞罕坝、重庆云阳等植树造林的先进典型,做出了抵御风沙、净化空气、保护农田、美化环境的历史贡献。二是兴修水利,造福人民。毛泽东基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①的深刻认识,高度重视和指示要求加大河流治理力度,消除淮河、海河和黄河等几条大河的水患水害。经过大规模治理之后的淮河历经几次特大洪水都没有形成大的水患。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的过程中,毛泽东先后批准或建议了荆江分洪区、新安江水电站、丹江口水库、葛洲坝等大型水利枢纽的开工建设,为经济发展和造福百姓提供了电力、水利基础。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宏大水利建设工程的伟大构想,体现出了战略家的超前视野与卓越谋略,这些美好愿景也都在以后变成了现实。三是治理污染,发展环保。“大跃进”时期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发展生产的不可持续性,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反对盲目搞工业化运动,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1973年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保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16页。

环保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中国环保行动的大幕正式开启。此后，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建立起了环保机构。

(二) 我们党的“利用改造自然思想”成果

上述实践行动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认识，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采用传统工业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下，我们党生态建设主题是“自然要素服务农林水各业并举”，蕴含着“最大限度地让自然为我所用”的主导理念。这是一种“利用改造自然思想”，它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建设理念而非生态文明理念，意在以人的建设热情弥补现有基础条件之不足，这一点与苏联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相类似。从现实建设情况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根本目标任务是尽快实现工业化，因而对生态环境的利用改造远远大于保护修复。此时我们党开展的绿化祖国、兴修水利、防治灾害等生态实践，都是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即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资源能源和自然条件。从理论逻辑看，“利用改造自然思想”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涵精髓与自然辩证法的基本理念，这可以从毛泽东的一些论述中窥见。比如，毛泽东深刻指出：“天下的空气，地下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①把自然因素和条件作为发展社会生产的根本前提，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生产力和自然富源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用“打麻将”来生动形象地比喻治理污染可以“变废为宝”的神奇之处，即上一家的废物往往可以成为下一家的原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废物再利用”观点的形象表达；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体现着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基本认识，与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观点相共通。但是，这种思想认识在赶超型发展战略中得不到全面彻底贯彻，未能推动当时的人与自然关系走向深入调节、和谐为本的高水平状态。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是我们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起始阶段，形成了“利用改造自然思想”的最初成果。它是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巨大需求而形成的生态环境建设整体思路，带有建设任务紧迫、突出经济效益的特点，既显示出显著的历史进步性，又体现出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一方面，必须肯定的是，利用改造自然的建设行动为新中国经济快速恢复提供了基本资源保障，也为以后的生态环境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且初步摸索了生态建设规律，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走向人与自然和谐迈出的第一步。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大规模经济建设背景下，“利用改造自然思想”中的自然界地位作用局限于社会生产力的自然要素，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最大化而生态环境价值被忽视，体现出自然价值认识不全面、自然规律认识不到位、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单一的局限性。一是利用改造自然的形势制约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采取的是赶超型发展战略和粗放型发展模式，是从服务经济发展的角度认识和开展生态环境建设的。全国狂热进行的“大炼钢铁”、“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文革期间盲目开展的围湖造田、毁林开荒、过量开采地下水、过度深翻土地等，是没有认识到自然资源和生态价值和环境价值的简单粗暴经济行为，成为日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累积成堆的社会生产原因。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理念的时代局限性。这一点集中表现为偏重人的主导地位而忽视生态环境规律的偏颇性。尽管毛泽东一定程度地认识到了自然和人的关系，但他的“人定胜天”、“战天斗地”等信念，过于突出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体性与主观意志而对自然价值认识不全、对自在自然尊重不够、对自然规律遵循不足。毛泽东曾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②，强调“江河为人民服务”^③，水土保持从解决生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70页。

^③中共中央国务院转水利电力部党委《关于全国水利会议的报告》(196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1998年，第576页。

活入手。当时全党全社会也都缺失生态观念,这从“除四害”运动中可见一斑。抗美援朝期间为应对美国的细菌武器而在全国掀起“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在粉碎敌人细菌战的同时也差不多把麻雀赶尽杀绝了。麻雀几近灭绝的命运虽然源于战争,但也与生态意识欠缺密切相关,即人们尚未全面深刻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没有把自然物种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问题。三是生态环保建设缺乏系统性与开放性。这一阶段的生态建设侧重人居环境的治理,局限于搞好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城乡卫生面貌的爱国卫生运动;生态环保以运动号召的形式、依靠实践经验开展,运动性与自发性特点突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采取单一的行政手段,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台各种环保措施;在较为封闭的国际环境中,也受生态环境问题专属资本主义而与社会主义无关的意识形态偏见影响,我国当时的生态建设缺乏与世界交流的开放性。1972年中国代表团赴瑞典参加了联合国首次国际人类环境会议,对世界生态状况与治理经验有了一定认识,但生态方面的国际交流没有大的进展。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是中国共产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起步和摸索阶段,我们党的生态建设实践与“利用改造自然思想”具有自然地位尊重不够、自然资源环境价值认识不全、自然规律认识不足、生态实践关系不清的初始性质,是我们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起点,具有丰富深刻的历史启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的“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思想”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邓小平领导下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实现资本积累的道路,以巨大发展成就创造了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奇迹和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日益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国家正处于全面解决温饱问题、由贫穷走向小康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效率不高与市场经济体制分化效应开始显现,而协调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缓解人与自然矛盾就成为我们党在这一历史阶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认识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是大问题”,因而倡导在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减灾防灾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并强调环保的法制化建设,形成了我们党的“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思想”。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行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我们党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事业体系,制定实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并以此为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主题,推动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是确立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改变了我们党“向自然开战”的观念。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在《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中提出了“要下决心在1980年底控制住污染,到1985年底基本解决污染问题”^①的污染治理目标。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保护环境是基本国策,并提出了经济、城乡与环境三大建设规划、实施、发展“三同步”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三统一”的环境与发展战略方针,形成了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体系。二是人口资源环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文革”之后我国

^①国家环保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企业生产的资源浪费现象十分普遍,党中央把最大限度利用资源能源看作是消除污染与保护环境根本途径,尤其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邓小平倡导使用沼气、水利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1980年他在四川考察时认为在农村发展沼气能够一举两得,解决农民燃料不足和用于发电,是个值得重视探索的方向,鼓励农村使用沼气等清洁能源;1982年他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要点《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中,就解决能源紧张问题指出:“火电上不去,要在水电上打主意。水电大项目上去了,能顶事。”^①由此推动了我国大型水电工程的较快发展。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强调要依靠科学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主张要到发达国家看一看,学习借鉴它们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三是把植树造林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中国先后确立了十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战略,其中占国土一半面积的“三北”防护林推动我国发生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成为蜚声国际的“生态工程世界之最”,邓小平欣然为其题辞“绿色长城”。自1979年起,邓小平连续10年参加北京市义务植树劳动,每次视察也尽量挤出时间在当地种树,并且关注植树造林理念的长期坚持和代际传承,强调中国的植树造林要坚持二十年、五十年,要从娃娃们开始培养植树爱树的好习惯。1981年邓小平提出的全民义务植树倡议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1983年邓小平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②的论断。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推动实施了退耕还林政策,弥补了林业生态缺口,缓解了水土流失与风沙频繁问题。四是资源环境立法取得较大突破。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十年,是中国资源环境保护立法的第一个黄金期。在邓小平的强调和建议下,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通过,标志着中国环保进入法制化轨道。1982年保护生态环境与防止污染被写入宪法,之后《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一大批法律颁行。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正式通过并施行,中国独立的环保机构——国家环境保护局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二) 我们党的“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思想”成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生态环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资源环境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整体性,制定“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并以此为主题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确立和实施的历史过程中,国家开始改变主要依靠命令控制手段治理生态环境、以计划经济手段确立资源能源价格低估环境价值的弊端,试行基于市场机制的资源环境经济政策工具,通过制度创新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保障。从“六五”计划开始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六五”、“七五”计划都对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提出了工作目标和量化指标。这些都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我们党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事业,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并落实到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的利用改造自然实践而言,具有了重视程度更大、覆盖领域更广、地位层次更高的特点,是一种时代性进步。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我们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成果是“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思想”,它具有承上启下的理论价值,既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利用改造自然思想”的继承发展,又在更大范围上对发展进程中的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做出协调,为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纳入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战略打下了认识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但在这一历史阶段,由于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满

^①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②国家环保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第39页。

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国家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点依然是加大自然资源开发力度以保证生产生活的物质供应,更侧重自然物质要素的经济社会属性而对生态保护修复功能重视不足,依然带有利用改造自然的功利性目的。这充分表明,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与一定程度满足的生活条件,必然缺乏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空间,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只能是一种理想化奢求。在具体的环境建设方面,这一历史阶段的污染控制集中于新污染的遏制与工业“三废”处理,环境质量管理也尚未提上议程。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由穷到富”发展逻辑主导下,自然资源能源的过度利用与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始终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积重难返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生态红利”而引起人们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反思。这启示我们,环保发展与生态治理仅仅局限于事业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更高层面的整体发展转型中获得新突破,这在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的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历史性体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阶段之后,践行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继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潮流中开启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我们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把人与自然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获得较大幅度的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是由部分小康迈向全面小康,主要问题在于效率与公正矛盾凸显,贫富分化突出,和谐社会建设提上日程。而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生态资源环境问题对于经济可持续与社会和谐的根本制约。在这一阶段,我们党先后围绕“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开展生态建设,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这是我们党在转型发展框架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成果,不仅提升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整体水平,而且酝酿出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

(一) 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

20世纪90年代,以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为标志,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共识。1994年中国政府在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确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年由江泽民首次提到,在1996年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并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和措施。一是强调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与社会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在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江泽民强调决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实现更快发展,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必然选择。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协调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基本战略。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具体化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体现出了生态文明方面的发展价值。二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强调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及其法律保障。江泽民强调良好生态环境对于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①党中央认识到尊重自然规律发展经济的重要性,1998年《全国

^①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5页。

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工程项目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努力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并举。1999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第一次把人口与资源、环境并列为主题。之后,在2001年、2002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保护改善环境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求统筹规划,标本兼治,争取减轻环境污染状况和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面对制约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匮乏、利用率低的问题,江泽民指出:“坚持节水、节地、节能、节材、节粮以及节约其他各种资源”^①,倡导全社会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江泽民把法律保障机制看作是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保证,1998—2001年期间先后强调“要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②“要完善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③。从依法治国出发重视生态法律,先后出台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推动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日益完善。不仅如此,江泽民认为环境保护需要全球人民共同努力,主张加强生态问题的国际合作。这一期间,中国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先后加入了《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环保公约,中国生态建设的国际合作有了较大发展。

（二）在践行科学发展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从党的十六大开始,“科学发展”成为我们党生态建设的主题,生态环境改善的“两型社会”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改革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科学发展”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与思路。一是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2004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④,要求遏制破坏资源的不良现象,促进资源的永续利用。2005年胡锦涛在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话中强调,生态环境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既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又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洁净放心的食物、水和空气的需要,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保证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良好环境。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胡锦涛把节约利用资源、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保护生态环境看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他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⑤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摆上重要战略位置。三是把“两型社会”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抓手。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在强调推进循环经济时提出要建设“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同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两型社会”发展目标,一年后被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推动形成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行动方案。四是强调以环境制度建设保障科学发展。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⑥在这段时间,经济手段由微观领域扩展到宏观领域,而且国家先后制定、修订、通过了系列生态方面的法律,如草原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由持续下降到逐步上升的历史性转折。

①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2—533页。

②国家环保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第492页。

③国家环保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第63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5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5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三）我们党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成果

我们党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在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到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中酝酿形成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党深刻洞察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历史和现实必然性,把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努力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探索,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明确了生态文明的本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具有发展本质上的一致性,都要求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提高资源节约意识、环境保护意识、解决环境问题的忧患意识以及开展环保工作的责任意识。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生态文明理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酝酿和展现,我们党在发展过程中开启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视以及调节责任的承担,形成了融入“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主题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成果。这一思想成果表明党已经把人与自然看作是和谐统一体,并将其看作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和生态文明状态的根本标志;也表明我们党把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纳入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义,还标志着我们党已经从传统的战胜自然、改造、利用自然的狭隘自然观转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在此基础上,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并将其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布局;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实质和根本任务,并且重视经济杠杆和行政杠杆作用,实施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贸易、绿色税收等宏观环境经济政策,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贯穿社会生产全过程。这充分表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重视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实行一种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由此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全面部署生态文明国家战略提供了直接前提。但党的十七大尚未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地位的根本性突破,表现为:生态环境问题被定位于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一个问题,生态文明战略高度还局限于科学发展内涵范围之内,尚未达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平等的战略地位,此外,“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任务要求尚未实现对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总贯穿和全覆盖,战略实施要求规定的系统性和操作性都有待加强。”^①这些都反映着我们党对生态文明趋势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价值意义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提升。工业文明进程中累积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解决,而必须在新的生态文明建构中化解,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伟大变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变成了现实。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发展战略追求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消除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而“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与环境质量不高的矛盾”成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任务,“生态文明国家战略与民族复兴大计”上升为我们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主题。我们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全面部署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并将其上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我们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历史上第一次做出的国家战略部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创新。在新时代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历经党的十九大,由党中央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正式

^①刘希刚、刘扬:《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历程中一脉相承的最新理论成果,在战略高度、理论厚度和思想深度方面体现出无与伦比的超越性、科学性与革命性,是新时代实施生态文明国家战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美丽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大计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执政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世界生态改善做出巨大贡献而被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阶段性和根本性的生态成效。不仅全国森林覆盖率有了显著提升,三北防护林工程、库布齐治沙、塞罕坝植树造林成为全球生态环境建设先进典型,而且水土流失、沟壑林立的黄土高原生态开启了由“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向“整体好转、局部良好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中华母亲河黄河也开始由黄变绿。在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一系列建设主题变化与思想成果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了我党历史上战略站位最高、设计最严谨、实施最得力的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的进入国家战略全局、生态民生与生态关爱并重、贯彻最严法治制度、体现世界视野和世界引领作用的显著特点,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边缘话语向主流话语、从领域话语向全局话语、从中国话语向世界话语的重大转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变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凸显,推动“生态文明国家战略与民族复兴千年大计”成为我们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为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最高层次的战略抓手。在这一主题的形成过程中,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写入党章,要求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之中,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不再局限于环境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而是上升为体现党和国家主导价值的重大战略,实现了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又一次重大理念创新;在我党生态建设史上第一次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目标,以及“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未来目标,并明确了建设方针、重点任务与行动要求,使生态文明成为关乎国家命运与民族复兴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的决定,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实施提供了制度和法治保障。此后,党的十九大全面布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展现美丽中国、美丽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前景。十九大报告从国家发展、民族大计和人类命运三重维度出发,强调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中的核心理念、“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提升到历史最高层次;聚焦新时代社会生态需求,设计从基本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美丽中国再到美丽现代化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战略行动;呼吁全世界人民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提出美丽世界建设的中国方案。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2019年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以“五位一体”之一、基本方略之一、新发展理念之一、三大攻坚战之一,再次强调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向全党全国人民传递出建成生态文明的决心信心。

（二）新时代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其伟大成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时代场域。作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由“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大

计”的战略地位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环保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民本价值观、“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制度保障观、“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建观构成的、生态文明“目标—道路—核心—价值—保障—外部关系”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提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矛盾、新布局、新理念、新方法与新追求。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新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科学反映。这一思想告诉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转变,而且人与自然关系矛盾也由之前自然资源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转变为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与生态环境质量不高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优美生态环境是萦绕在每个老百姓心中的“梦”,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中之重。第二,习近平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明确了环境体系、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体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布局。第三,习近平强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①,以满足民生需求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出发点;同时又用“公共产品”、“绿色银行”、“金山银山”、“生命共同体”、“眼睛”和“生命”等新词语妙喻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明确把生态关爱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价值立足点;民生价值和生态关爱的统一,是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价值理念的根本体现。第四,习近平提出了贯彻“两山论”、开展“统筹治理”、坚守“生态红线”、坚持“久久为功”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方法论,反映着生态与民生、经济与环境的辩证统一规律,蕴含着辩证法原理与生态思维理性,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动的基本原则方法。第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描绘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中国前景,还具有不拘于一国一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眼光和“万紫千红春满园”的博大胸怀,倡导国际社会“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②;美丽中国与美丽世界的交相辉映,构成了习近平心目中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追求——既是国家战略与民族复兴大计,又是关系人类命运的长久之计。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涵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第一次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美好前景。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文明理念与新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中国特色在中国大地融汇的理论成果,是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的直接反映。它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观、“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观、“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融合”政治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观,是超越性的自然观、生态哲学和新境界的生态文明理论。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它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命题,在宏观层面上明确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原则、任务要求与重点方向;在中观层面上指示着生态破坏型道路走向生态友好型道路,引领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在微观层面上为防止和警惕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的“公地悲剧”、“私地闹剧”提供了方法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观创新和发展观创新的统一,它让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标志性发展理念,成为拓展社会主义发展内涵的新领域、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空间。第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发出的最宏伟、最坚定的生态文明宣言,是人类命运选择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思路。它提出了反对生态殖民主义、超越传统环保运动的世界生态文明新路,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是

^①《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年5月20日。

^②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网2017年1月19日。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在普遍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宣告中国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小国寡民的退路、“三大陷阱”的歪路、生态殖民主义的邪路，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道路。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视阈下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阶段与思想成果，表现出生态文明逐渐纳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整体的历史逻辑，即从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到社会主义事业组成部分，再到和谐社会与转型发展重要内涵，最后到国家战略与民族复兴大计，实现了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融合。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表现出对自然价值的认识由偏颇到全面的变化、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理解的拓展加深、对人与自然矛盾变化的历时性认识和建设战略应对的时代性进步。与时俱进的每一个思想成果，都体现出对“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众生平等”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弘扬，都把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理解推向了更高层次和境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启示。第一，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就是一个社会命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人与自然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发展中不断显性化、主流化的过程，既表明了人与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不可分割性，也深刻启示我们建设“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最终价值目标，生态文明建设不囿于环保工作，生态优先不只是要求环保优先，仅仅是生态好并不等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关系和谐与人与自然和谐的辩证统一体，脱离社会关系建设生态文明是“乌托邦”的想法，中国生态文明只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中实现。第二，人与自然和谐是民生需要与优美环境的辩证统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历史结论，带给我们关于人的需求和生态价值如何实现辩证统一的深刻思考。民生与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告诉我们生活富裕但生态退化不是生态文明，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也不是生态文明，在新时代应该把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同时必须以生态环境平衡稳定为前提条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切实防范生态风险。第三，协调经济与生态的矛盾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环节。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生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逐渐提升，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战略性、根本性、贯穿性的重大主题。经济与生态的矛盾的本质表现为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指出的获得“最大生产量”的人类对策与获得“最大保护”的生态对策之间的矛盾，它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最根本矛盾。但是，如果摆脱传统工业文明的思维窠臼，在新的生态文明理念下理解和探索人与自然关系，那么在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的前提条件下，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并不对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离开生态谈经济，也不能离开经济搞生态，要坚持以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为指导，统一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人口生产力、智慧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与环保的矛盾冲突，为人与自然和谐打下坚实的社会生产基础。第四，生态文明意识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必要动力。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生态建设历程表明，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是影响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因素。当前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感知关注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权利有余而义务不足，以及重直接轻间接、重自己轻他人、重眼前轻长远的现实问题。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培育与生态文明国家战略相适应的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包括生态哲学世界观、生态环境价值观、生态伦理道德观、生态文明责任观等，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行动。第五，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既是国家民族之事又是人类命运之系。在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的三百年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累积形成了影响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的人与自然和谐追求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越来越具有国际视角、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体现出巨大的时代进步性。实践证明，当前人类对于生态文明的追求已经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超越政治制度、阶级民族种族、宗教信

仰、意识形态的共通性,逐步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世界共建行动。在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凝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奋斗中,美丽中国必定要与美丽世界同行。

(责任编辑:程天君)

The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Course of Pursuing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y the CPC

LIU Xigang

Abstract: Consid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y, the CPC's pursui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has gone through four historical stages: the stage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exploration,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series of successive and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formed, such as the thought of utilizing and transforming nature, the thought of coordinating economy with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 though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PC's series of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how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It embodies the historical leap from shallow to deep, from low to high, 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part to whole in our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la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for u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a new stag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a's 70 Years since 1949;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urse of pursuing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bout the author: LIU Xigang,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